

替罪羊

勒内·吉拉尔 著 冯寿农 译

René Girard

ÉMISSAIRE
LE BOUC



東方出版社

LE BOUC ÉMIS SAIRIE

替罪羊

勒内·吉拉尔 著 冯寿农 译



——本书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赞助，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孙 涵

装帧设计:李颖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替罪羊/(法)勒内·吉拉尔著. 冯寿农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

ISBN 7-5060-1539-0

I. 替… II. ①吉… ②冯… III. ①社会人类学-研究
②神话-研究 IV. ①C912.4 ②B932

替 罪 羊

TI ZUI YANG

(法)勒内·吉拉尔 著 冯寿农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州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1539-0/I·81 定价:16.00 元

Paru dans Le Livre de Poche:
DES CHOSES CACHÉES DEPUIS
LA FONDATION DU MONDE.
CRITIQUE DANS UN SOUTERRAIN.

Tous droits de traduction, de reproduction et d'adaptation
réservés pour tous pays.

© É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82.

composition réaiesée par C.M.L., Montrouge

IMPRIMÉ EN FRANCE PAR BRODARD ET TAUPIN

58, rue Jean Bleuzen-Vanves-Usine de La Flèche.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CAISE-14, rue de l'Ancienne-Comédie-
Paris.

ISBN: 2 - 253 - 03738 - 9

中文版由法国 Grasset & Fasquelle 出版社授权独家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1 - 5334 号

前 言

勒内·吉拉尔缓慢地、执著地、有条不紊地构建着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位思想家著书立说，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出版，建成一座理论大厦。他由此入手，勾勒出人的新形象，特别是，读者从这里可以想像一个已被清污的、干净的社会新秩序的雏形。从这一角度看，《替罪羊》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差不多是完成了吉拉尔思想体系的最后一本书。它汇集、综合了他前几部著作所展开的分析，随后转向出神入化的阐述：紧紧追踪人类社会一种最常见的现象——从苏格拉底^①到现代的古拉格^②，存在着迫害行为，它成了每个社会秩序创始的和结构的原则。此书的目的在于试图找到一副消除这种迫害现象的解毒剂。在吉拉尔看来，基督这一人物是研究的中心，形象的楷模，他的话语给那些听懂了他的阐释的读者提供了最后摆脱恶的宿命论的方式。读者可以回忆这些话语，在他初期写的两部书《隐蔽的批评》和《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里已经说过。在这两部探讨性的文学批评论著里，吉拉尔已经表达了他思想中的重大假设：“模仿的欲望”，其中心思想宣扬了人永远不是自身欲望的根源，欲望永远源自被模仿的第三者，源自一个既是

①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 470—公元前 399 年）：古希腊哲学家。——译注

② 古拉格：原苏联劳改犯集中营。——译注

楷模又是对手的介体。一种不可避免的人的规律把我们引入陷阱,关入地狱般的三角里:人只希望他人所希望的东西。这种特殊的关系解释了人与人之间持久的竞争,并揭示了人际关系中充满永久的暴力。阅读他的这两部论著,可以看到许多文学事例证实了这一假设,似乎小说家跑在理论家前面,用直观发现了这一隐藏的真实。斯丹达尔的虚荣心?普鲁斯特的赶时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充满仇恨的偶像崇拜?塞万提斯的英雄主义?文学中存在许多不同的案例,然而非常相似,因为每一个案例都能看到模仿的现象,并受其控制。堂·吉珂德只想模仿阿马迪斯的希望,就像于连憧憬拿破仑所憧憬的东西,或者斯万希望嘉尔王子所希望的东西……文学的虚构事实证明了“模仿的欲望”。

然而,要使人相信“模仿的欲望”的存在,还缺乏足够的论据。作为理论,实物的检验是必不可少的阶段。于是,他随后又发表了两部宣扬吉拉尔主义的论著——《暴力和神圣》以及《论世界创立以来的隐蔽事物》——它们都是开放性的文本。为了调整他的这一概念的角度,吉拉尔往后退,以扩大视野。历史、神话、人类学资料、宗教典籍等都被调动起来,去探讨“模仿的欲望”的表现和结果。吉拉尔循序渐进,步步深入,不久,他把系统的所有部分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现在,在欲望的基础上又连接了“危机”的思想:在一个社会里,模仿一旦被激起,也就是说所有欲望都趋向未分化状态,这时,如果团体的所有成员在最后关头一致要放弃他们的共同欲望,目的要通过牺牲一只替罪羊进行集体的净化的话,那么,团体的严密的结构就一下子动摇了,开裂了,社会的统一性将要炸裂,甚至碎片横飞。

吉拉尔的人类学的所有元素都齐全了。弗洛伊德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由于不足以阐释而被拒绝。他用模仿的关系的理论

重新解读俄狄浦斯的悲剧,发现俄狄浦斯的罪恶不是杀害他的父亲,而是他企图缩小差异,把同类和他类置于一个可怕的混沌里。那里存在着神话的关键,同样存在着一个“隐蔽的东西”中最主要的东西之一。俄狄浦斯通过弑父,通过激发模仿父亲的欲望到极点,非常快地打乱了忒拜王国的基本平衡。而要恢复平衡,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他本人的死亡。此乃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人类社会只有通过调整相互的暴力,才能永久维持下去。宗教的牺牲仪式的原则是:建立一种替代其他暴力的“创始的暴力”。一个人的死亡换来大家的生存。

不过,幸好勒内·吉拉尔没有停留在这种悲观的论述上,这正是《替罪羊》这部论著——他的理论体系的系列论著的最后一部——的新颖之处。事实上,他扼要地指出:牺牲的方案不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一种法则的文化。在社会看来,为了维护共同的秩序和利益,他们的死亡是合乎逻辑的,甚至是合法的。但是,这种文化没有对此视而不见,没有假惺惺地随声附和,而是大胆地承认他们是无辜的。我们的正统文化是以两部《圣经》作为楷模并被赋予意义的。实际上,吉拉尔认为:幸亏有了犹太—基督主义,宗教日常欺骗的游戏才停止了。所有的史料都叙述历史的真实,并发现社会运行的死亡的机制。可以说,它们教我们恶的基本东西,并给我们提供解救的办法。吉拉尔这样写道:“我们相互宽恕的时候到来了。如果我们还在等待,我们就再也没有时间了。”通过分析,有了人们所称的“智慧”。《替罪羊》是一部给人新的希望的书。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纪尧姆·德·马肖和犹太人	1
第 二 章 迫害的诸类范式	15
第 三 章 什么是神话?	29
第 四 章 暴力与巫术	57
第 五 章 特欧体瓦坎神话	71
第 六 章 阿兹神话、克里特神话 和提坦神话	83
第 七 章 众神的罪孽	95
第 八 章 神话科学	119
第 九 章 《圣经》中耶稣受难的 关键词	127
第 十 章 惟有一人死去	141
第十一章 施洗的圣一约翰被斩首	159
第十二章 彼得的否认	189
第十三章 格拉森魔鬼	209
第十四章 自相纷争的撒但	233
第十五章 历史与圣灵	249

第一章 纪尧姆·德·马肖和犹太人

14世纪中叶法国诗人纪尧姆·德·马肖写的《纳瓦尔国王的审判》是值得好好阅读的。当然,作品的主要部分只是一首传统风格和主题的艳情诗歌,但是诗歌的开头是叙述触目惊心的故事,是描写一系列混乱的灾难性事件。纪尧姆曾亲眼目睹,他心惊胆战,最终隐居在家中,等待死亡,或者说在家苦修,等待生命的终程。在等待中,一些事件是作者虚构的,另一些事件也只有一半真实。然而读了这首叙事诗,给人的感觉是:字里行间大概发生了某些真实的事件。

天上有迹象,下了石头般的雹雨,砸伤了行人,许多城镇都被毁坏。在纪尧姆居住的城市——他没有说明哪一个城市——人死了许多。有些人致死是因为犹太人和他们在基督徒中的同谋的恶行。这些人究竟干了什么,会在当地居民中引起这么多的死亡?他们在河里下毒。河水是惟一的饮水源。天庭审判向居民揭露了罪行的肇事者,命令惩罚恶行,杀死肇事者。然而,人还是不停地死去,而且越来越多,一直到春季的某一天,纪尧姆听见街上男男女女嬉笑着,唱着歌;一切都过去了,情诗又再开始了。

从诗歌发表到16、17世纪,批评家们没有盲目地相信诗里提及的事件。在我们的时代,许多学者还是同意批评家的看法,越来越怀疑诗的内容。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的解读和释义,过

乍一看,在历史事实方面,纪尧姆·德·马肖的诗歌的确容易受到现代怀疑主义之风的攻击。但认真思索一番,就是在今天,读者仍可以通过叙事的虚构看到真实的事件。他们可以既不相信天上的迹象,也不相信对犹太人的指控,但他们不能用同一方式看待所有难以置信的题材,不会把所有的内容都视为虚假的。纪尧姆不会无中生有。的确,他是位轻信的人,他反映了人群歇斯底里的情绪。尽管如此,他在诗中所说的无数死者却是真实的,显然是法国北部在1349年至1350年爆发的鼠疫引起的。屠杀犹太人也是真实的,那些被鼠疫感染的人群几乎在到处传播着犹太人放毒,在他们眼里,犹太人该杀。鼠疫给大家带来的恐怖足够证实这些流言蜚语,它导致大规模的屠杀。

背信弃义的歹徒：

令人憎恨的犹地亚人，

他们聚财敛钱，

井、河、泉里的清水

数处已变毒液，

倘若饮之，顷刻暴死。果然，乡村城镇
人们成批成批地倒毙。
终于，致死的投毒
不打自招地暴露。

上帝坐高望远，
君临一切，赋予一切。
他再也不容倒行逆施，
揭露恶行于光天化日下，
要让恶徒知道
他们同样要付出生命和财产。
所有犹太人都该死：
上绞架，下油锅，
溺水淹死，
刀斩斧剁，

同样要处死可耻的
基督徒内的同谋。^①
中世纪的社会非常害怕鼠疫，一提起它的名字，就心惊胆战。
他们尽量避免说出这个可怕的字眼，宁可看着疫情越来越严重，也

① 纪尧姆·德·马肖的全部作品由埃内斯特·赫普夫纳 (Ernest Hoepfner) 在法国旧文献公司出版，1908 年版。本文引自第一卷《纳瓦尔国王的审判》第 144—145 页。

不肯采取必要的措施。他们无能到极点,承认现实,逆来顺受,面对瘟疫视若无睹,拒绝反抗。这种置若罔闻的绝望态度助长了对“替罪羊”^①的围猎。

无独有偶,拉封丹在他的寓言“鼠疫的病动物”里,也暗示了中世纪人的这种几乎是迷信的害怕:怕提起那个可怖的字眼,怕一旦说出口,它会给人群带来不幸:

鼠疫(既然应该用它的名字来叫它)……

这位寓言家使我们了解到集体欺诈的行为:把瘟疫视为上天的惩罚,众人均等不一地受到损害,雷神激怒了;为了摆脱灾难,必须找到罪犯,让他自食其果,或者如拉封丹所写的,把他“奉献给”神。

在寓言里,被查的第一批嫌疑犯是那些猛兽,它们温顺地表述它们的行为,它们立即被宽恕。最后来的是驴,它是最不残暴的牲畜,因此,它也是最弱小、但最不受保护的动物,然而最后却被定为瘟疫的罪魁祸首。

历史学家想像,在一些城镇里,一听说附近发生鼠疫,瘟疫还未袭来,就开始屠杀犹太人。纪尧姆的叙事诗反映的可能就是这一类现象,因为屠杀正是发生在瘟疫的高峰前。但是作者把许多死亡归因于犹太人放毒,暗示着另一种解释。如果这些死亡是真实的——把它们当作虚构是毫无道理,那么,他们可能是这场灾难

① J.N.比拉本(Biraben):《法国、欧洲、地中海国家人民与鼠疫》,巴黎—拉海牙出版社,1975—1976年版;让·德吕莫(Jean Delumeau):《西方之恐怖》,巴黎,1978年版。

的第一批受害者。但是,纪尧姆并没有这样感觉到,甚至事后回顾时也没有想到。在他看来,传统的替罪羊总是被解释为瘟疫开始阶段的祸端。而以后阶段,作者承认存在一种纯粹是病理的现象。灾难蔓延之大,最终使以阴谋放毒的解释不攻自破。但是纪尧姆不是根据它的事实去解释瘟疫的后期事件。

此外,人们可以自忖:诗人以何等的方式承认鼠疫的存在,因为他一直到结尾都避免直接写下这个不祥的字眼。在关键的时刻,他谨慎地用一个好像那时还很少使用的希腊语词“*epydemie*(瘟疫)”。显然这个词在他的诗歌里没有像在我们的作品里使用频繁。它不仅是一个相当令人畏惧的词,更是一个替代词,一个不直接称“鼠疫”其名的新方法,这纯粹是在语言上找到一个新的替罪羊。纪尧姆告诉我们:从未能确定造成许多人在那么短时间内死亡的性质和原因:

物理学家、医生,

无人知道死因,

究竟是来自何方?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任何药物无法治愈)

除了只知道它是一种病,

人们称为“瘟疫”。

在这一点上,纪尧姆还是相信公共舆论,而不是凭自己思考。在14世纪,从“*epydemie*(瘟疫)”这个学术性的词上总是会闻到“科学性”的香味,有点像过去人们为驱除鼠疫散发的臭味,在街头巷尾用烟熏疗法散发的芳芬的气味一样,这种“科学性”香味压抑着

人们的不安。为一种病选择一个好名字似乎已经治愈了一半,使自己产生错觉,似乎已经控制了病情,人们经常为无法控制的现象重新命名。在我们的科学仍无能为力的一些领域里,这种字面的驱魔法仍不停地诱惑着我们。简言之,人们通过拒绝称呼“鼠疫”,把它“奉献给”神了。在这里,一种言语的牺牲——当然是一种无辜的牺牲,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在此之前已发生的人的牺牲,它们的基本结构是相似的。

甚至往前回溯,所有真实的和虚构的集体替罪羊,犹太人和鞭笞派教徒^①,石头雹雨和“epydinie(瘟疫)”,在纪尧姆的叙事诗里继续有效地起作用,结果,他从来没有看到我们所说的“黑死病”灾害的单一性。作者继续察觉到多少有点独立的大量的灾难,或者仅用宗教意义把它们相联系,就像“埃及之难”^②一样。

我上述所说的几乎是很明显的。长期以来,我们与读者以同一种阅读法理解纪尧姆的诗歌,现在,读者不需要我了。然而强调这种阅读法不是无用的,在这种阅读过程中,我们不乏勇气和能力。整整几个世纪以来,大家都承认这一阅读法,几乎众口一词,从未见过其他异议。今天,我们重新解读,这更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毫不犹豫地抛开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解释,我们确定他不知道他所说的东西。离现在已过了几个世纪,我们现代人比他知道得更多,我们能够纠正他的说法。我们有能力确定作者没有看到事实。我们还以一种更勇敢的胆略毫不犹豫地肯定这种事实恰恰是他给我们带来的,尽管他是盲目的。

① 13、14世纪天主教的一派,教徒当众自答借以赎罪。——译注

② 埃及之难:据《圣经》记载,上帝对古埃及降下一连串的灾难,迫使其法老(国王)赶走古以色列人(犹太人)。——译注

难道说这种解读不值得广泛地赞同吗？我们对它是否表现得过分宽容？在司法上，只要在一点上证明，说证人缺少公正就够了，就足以驳回证据。按常规，我们把历史文献当作司法上的证据。然而，我们却违反了这个规律，把纪尧姆·德·马肖的诗歌当作证据。其实，他也许不值得我们如此信任。总之，我们确定在《纳瓦尔国王的审判》里所提及的迫害是一种历史事实。我们意欲从一个连根本性的东西都弄错的文本中梳理出真实的东西。如果我们完全怀疑这个文本，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当作百分之百的嫌疑物，就会拒绝寻找任何真实的东西，甚至对迫害的原始事实也不例外。

由此得出了令人惊讶的结论：犹太人事实上是被屠杀的。我们的脑海里一下子出现了一个答案。我们没有孤独地阅读这个文本，同一时期还存在着其他的文本，它们反映同一主题，但比纪尧姆的诗作更有价值。那些作者表现出较少的轻信，使作品形成了一个史实丰富的网络，我们把纪尧姆的文本置于这个网络中间，正是依靠这个语境，我们在我所援引的段落中成功地分清了真与假。

的确，鼠疫期间的反犹太迫害成了相对而言众所周知的一组事实，甚至是一种知识，它在我们心中激起了某种期待。纪尧姆的作品回答了 this 期待。从我们个人的体验和与作品的直接接触上看，这种期待并没有错误，但从理论的观点上看，它还是不够的。

虽然存在着历史知识的网络，但是，不管从类似的理由或从不同的理由上看，网络中的诸文献永远不会比纪尧姆的作品更确切。我们不可能把纪尧姆的作品置于这个背景中，因为我已经说过，我们不知道他讲述的事件发生在何处。可能在巴黎，也可能在兰斯，或者可能在另外的第三个城市。但不管怎么样，背景并不起关键作用，即使它一点也没有告诉我们发生的地方，现代读者最终也

会得出与我们相同的结论：杀害受难者可能是错误的。因此，读者可能会想到文本说的是假的，因为这些受害者是无辜的；但他同样也可能想到文本说的是真的，因为受害者是事实存在的。他最终总会像我们一样准确地分清真与假。是什么给予我们这种权力？苹果箱里一个苹果烂了，就将它整箱扔掉，根据这种原则行事是适当的吗？如果对现代苛刻的批评家听之任之，不加阻拦，他们就可能对作者的一时轻信和一点天真全盘否定，我们难道该对他同样怀疑吗？有人说所有历史知识都是不真实的，连我们所研究的文本都无法梳理出任何真实的东西，甚至迫害的史实，这种说法对吗？

对所有这些问题，答案只能是不。不加区别的怀疑主义是不考虑文本的性质。在文本的真实题材与虚构题材之间存在一个特殊的关系。当然，刚开始读者不会说“这是假的，那是真的”，他只看到一些多少可信与不可信的题材。死者越来越多是可信的，可能是一场瘟疫；但放毒是不大可信的，尤其是纪尧姆所表述的规模之大，因为在14世纪，不可能有一种毒性如此巨大的药物。作者对所谓的罪犯的仇恨是很明显的，这使他的观点受到怀疑。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两类题材之间至少暗地里互相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就无法辨认它们。倘若真的爆发一场瘟疫，那它就可能燃起沉睡的偏见之火。迫害的欲望自然集中于宗教的少数派，尤其是在危机时刻。莫须有的指控实际上是为了一场真实的迫害辩护。纪尧姆轻信地重复这类指控，像他这样的诗人大概不会特别残暴，他之所以相信他所叙述的故事，是因为他周围的人大概都相信它。因此，文本暗示着荒诞不经的谣传形成了激昂猛烈的公众舆论，它暗示着一个大屠杀前风雨满楼的气氛；作者在作品中告诉我们，事实上，发生过一场屠杀。

在非真实的表述语境里,其他的真实性却得到证实并变成可能性。反之亦然,在真实的表述语境里,其他的非真实不太可能纯属于“虚构功能”。为获得杜撰发明的乐趣,虚构可能无根据地发挥作用。然而,我们能辨认出想像的东西,但不是任何想像的东西,而是那些追求暴力的人的特别想像的东西。

因此,在文本的所有表述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的契合和呼应,我们只有通过一种假设才能分析它。我们所读的文本的根源来自以迫害者的观点叙述的一种真实的迫害。这种观点不一定是骗人的,因为迫害者相信他们暴力的理由,他们把自己当作伸张正义的人,在他们看来,受害者是罪该万死的。但是这种观点部分是真实的,因为他们自恃有理使这些迫害者不再隐瞒他们屠杀的事实。

就信息的真实性而言,一个叙事文本的整体价值,远不如可悲的历史文献,这已成常识了。但在纪尧姆·德·马肖的文本前,应该打破这个常识。如果作品表述的一些背景有利于迫害,如果它向我们呈现的受害者是属于迫害者习惯选择的人物,如果它以赞许的口吻肯定迫害者,将一切灾难都归咎于受害者身上,那么,通常迫害就可能是真实的;如果文本本身肯定这个事实,就没有理由怀疑它。一旦读者感受到迫害者(作者)的观点,那么作者指控的荒谬性非但不能损害一个文本的信息价值,而且加强了它的可信性,尤其是它本身所反映的暴力方面的可信度。如果纪尧姆把祭祀仪式的杀婴故事添加入放毒事件里,那么他的表述就显得更加不可信。但是对于他向我们传递的屠杀事实,其真实性没有丝毫减弱。在这类文本中,指控越是不可信,屠杀的事实就越可信,因为它们向我们传递了一个社会心理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屠杀几乎是肯定发生的。相反,屠杀的主题加上瘟疫的主题,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